【文学与艺术研究】

晚清小说的图书馆书写及其现代意义

张翼

摘要:近代藏书方式的变迁是晚清知识转型的一个表征。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晚清士人的求知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表达。20世纪初,图书馆开始成为小说的表现对象。围绕藏书、编目、读者,晚清小说通过图书馆书写亦真亦幻、亦实亦虚地讨论了知识的源流、秩序与功能等问题,以矛盾和抵牾的方式留存了晚清知识转型的诸多面相。这种书写包蕴了晚清士人驳杂的知识经验、知识体系与知识观念,从对象、体验、观念等层面丰富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

关键词:晚清小说;图书馆书写;知识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12-0140-06

近代藏书方式的变迁是晚清知识转型的一个表征。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晚清士人的求知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表达。1904年1月,上海独立社出版的十回铅印本《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叙述者用“藏书处”与“议事所”“公学堂”“博物院”等机构一起构建出了理想社会“自治会”。小说中的“藏书处”并非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传统藏书处,而是指近代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①。此后,图书馆开始成为晚清小说的书写对象。图书馆向想象世界的渗透,源于公共图书馆通过改变书籍度藏,参与晚清知识转型,对晚清士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叙述者讲述图书馆收集何种藏书,如何整理藏书,如何使用藏书,既是在叙述事实,也是在向读者播撒知识源流、秩序及功能的种子,并因此展示自身的知识经验、知识体系与知识观念,从对象、体验、观念等层面丰富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

一、知识来源的增益

晚清小说的图书馆书写关注知识来源的增益,从“中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两个维度叙述图书馆藏书之“全”。这体现了晚清士人拓展知识来源

的趋势。知识来源的拓展在让他们感觉振奋的同时,也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知识扩张所带来的焦灼,这从小说图书馆叙述中可见一斑。

1. 建构“全”的维度

《乌托邦游记》《痴人说梦记》《新石头记》《电世界》等小说对图书馆的介绍集中于藏书,着意刻画图书馆的藏书之“全”。《乌托邦游记》指出“飞空艇藏书楼”的藏书是来自“世界上各国的”^②,《新石头记》中的“礼让庄藏书楼”收有“五洲万国的书籍”^③,《电世界》的“春明塔藏书楼”特意强调“并不是专藏中国的书,世界各国的书统统都有”^④。

追求齐备本属藏书的题中之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小说构建“全”的逻辑与传统藏书有所不同。传统藏书主要遵循时间维度,强调“古”“今”俱全,期冀“观古知今”^⑤,“考风气之正变,辨古学之源流”^⑥。晚清小说则开辟空间维度,从“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两个维度建构藏书之“全”。

小说建构藏书之“全”的空间逻辑与图书馆的发展现实有重叠之处。罗振玉倡建京师图书馆时,就建议藏书应“分二大部,一本国,一外国”^⑦。学部明文规定各省图书馆均应收藏“中国官私通行图

收稿日期:2021-08-26

作者简介:张翼,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新乡 453007)。

书,海外各国国书”^⑧。藏书兼备中外不仅仅是晚清图书馆倡建时的构想,也被诸多倡建者付诸实践。福州鳌峰藏书楼 1902 年曾专门筹资 2000 两白银,赴上海购买一批“新出译编时务各图书”^⑨。

叙述者之所以从空间维度构建藏书之“全”,意在向读者传递知识源流增益的信息。中国有着悠久的藏书传统,在中国读者的经验中,“藏书”与“知识”天然地具有“词”与“物”的关联。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藏书规划知识范畴,他们熟知的《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皆由藏书汇聚而成。藏书具有内在的知识结构,经、史、子、集等分类标准既呈现知识体系,也确立知识秩序。藏书涵养求知旨趣,诸多珍本、善本成就也规划了中国历代读书人的求知方向。藏书形成文化区隔,读者可以根据占有书籍的多寡、所收版本的良莠判定藏书者的文化身份。藏书表征知识权力,读者默认藏书仅供特定的、少数人群使用,也因此服从只有少数人能够接受教育的知识权力分配法则。

当叙述者用文字把“世界各国的书”“五洲万国的书”带入图书馆,就是利用读者经验中“藏书”与“知识”的呼应对照,通过使“世界各国的书”成为“藏书”的策略,赋予“世界各国的书”与“中国书”一样的知识地位。这种由时间到空间的逻辑转移看似剧烈,却仍在“藏书—知识”的整体经验框架内。因此,叙述者所为并不是要瓦解读者原有的知识经验,而是要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以此引导读者接受知识来源由“中国书”向“世界各国的书”的拓展,同时也缓解这种变化可能使读者产生的不适、抵触。

2. 知识之“全”引发的压力

随着“世界各国的书”进入图书馆,虚拟图书馆里的藏书数量迅速膨胀。不断增加的藏书,在给予叙述者鼓舞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向他们施加压力,使其所说与所思出现分裂。《乌托邦游记》中的《阅小说室章程》集中体现了叙述者面对知识扩张时的外强内弱。叙述者言辞豪迈,为夸张“阅小说室”藏书来源广泛,他在《章程》里甚至突破了“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修辞,将空间放大至“地球”与“地球以外”,强调所收集的小说来自“地球内及地球外无论何国”^⑩。他还自信地在《章程》里夸矜小说室早已将应有小说“尽行预备”,表白“本书室所藏各处各种小说,自问亦已完备”^⑪。然而,豪迈的言辞难以

掩盖叙述者的焦灼,他时刻担心遗漏已有之书,错过新出之书,因此将《章程》的一半篇幅用于制定各种制度以避免藏书失“全”。为防止遗漏已有之书,他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读者为“阅小说室”补充藏书,“如客人另有新旧小说,为本书室所不备者,本书室愿重价购之”,“客人有赠本书室所未备之小说书,本书室当题名推为名誉员”^⑫。为防止错过新出之书,他追求征集速度,宣称“地球内及地球外无论何处所有新出的小说,本书室于该小说出版后二点钟,即从空中电递器内递到”^⑬。即便知道如此速度已然超出了读者的理解,他也不愿放弃,只得另造“空中电递器”以说服读者。但叙述者自己也承认:“我又想起空中电递器的灵便,亦极奇怪,无论地球上哪个国度,科学无论如何发达,总没有从空中用电气递送物件的机器,不知如何发明?”^⑭这段自相矛盾的冗余剖白不是为了答读者之疑,而是为了掩饰“空中电递器”的无稽与突兀而不得不做的解释。

上述大费周章的规定和琐碎、冗余的解释,透露了叙述者对藏书之“全”的执着,同时也暴露出叙述者对能否达到藏书之“全”的担忧。《乌托邦游记》并非个例,《痴人说梦记》《新石头记》《电世界》涉及藏书时,叙述者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大叙述的密度,同样流露出为“全”而“全”、忧“缺”惧“慢”的焦灼情绪。晚清小说关于图书馆藏书之“全”的描述,显示出晚清士人的两难境遇,一方面他们乐于促进知识来源的增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因知识来源增益、知识规模扩张而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紧张。

3. “全”与“公共”之间的偏差

叙述者描述图书馆时重在藏书,但这种书写倾向与历史文献有所偏差。从游记、日记等早期图书馆文献来看,图书馆给予晚清士人的最强刺激是“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⑮的公共特征。这一公共特征让晚清士子看到了破除知识特权、普及民众教育的希望。梁启超就曾指出,图书馆与学校一样具备“公共教育之机关”^⑯的功能。“五四”之后李大钊沿袭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⑰。沈绍期则将图书馆命名为“市民大学”^⑱。文学叙事重视“藏书”,文献记录却强调“公共”“教育”,二者的偏差折射出晚清士人此时面临的真正问题。

共享知识固然激动人心,但当时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使用知识,而是知识究竟是什么。

叙述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列举图书馆里收藏了什么书,正是在向读者展示知识的构成。这也解释了《乌托邦游记》为什么不惜以破坏叙事连贯性为代价,将《阅小说室章程》整体植入叙事,却并不利用《章程》指点读者怎样使用图书馆,而只是一味地强调和维护藏书之“全”。

如前所述,叙述者为了使读者接受“世界各国的书”同样具备知识地位的观念,只对读者的整体知识经验框架做出局部调整。可是“世界各国的书”一旦进入图书馆,图书馆里的知识就不仅仅只是数量上的增长,而必然会出现整体格局的变动。不管叙述者是否意识到,只要知识是什么成为问题,知识格局的整体变动就已经开始。不管叙述者是否愿意直面这一问题,他们避开书籍的“使用”而大谈“藏书”,在兴奋地叙述图书馆藏书之“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为“全”而“全”、忧“缺”惧“慢”。这些叙述行为本身,已经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二、知识秩序的建立

晚清小说的叙述者尽可能“全”地为图书馆收集藏书,也为自己制造了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区分和摆放“中国书”和“世界各国的书”,使之井然有序?

1.“国别”分类法

由于叙述者主要从空间维度建构藏书之“全”,因此他们大多直接采用国别标准对书籍进行分类。《电世界》的“春明塔藏书楼”是将所有藏书按国别分为三层,“大约下层是非澳的书,中层是欧美的书,最上一层是中国的书”^①。《乌托邦游记》的“阅小说室”首先将小说分为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国的”,甚至“乌托邦的”“无是国的”“子虚国的”^②,再将各国小说或根据体裁,分为“甲、章回。乙、传奇。丙、札记”^③,或根据“命意及作法”^④,评估小说的品质,从上到下依次摆放。“阅小说室”的分类标准相对复杂,但书籍出自何处仍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在叙述者看来,体裁、品质即便可以作为标准,也不能像国别那样独立完成分类。

无论是传统藏书处,还是现代图书馆,都需借助特定的分类标准来对藏书进行管理。一套有效的分类标准应兼具涵盖与区分的功能。一套成熟的分类标准既可为管理藏书提供依据,也可深入地把握和体现藏书所承载的知识,并通过陈列对其体系

和秩序加以物质化呈现。在“世界各国的书”成为“藏书”之前,中国传统藏书已经形成稳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标准。“世界各国的书”的加入,引发图书馆藏书规模的变化,更深刻地改变了“藏书”所承载的知识的变化,传统的分类标准已无法完全实现涵盖和区分的功能。

小说的叙述者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虚拟图书馆里的分类问题,现实中的晚清图书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通用的、行之有效的分类标准。沈绍期 1918 年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时,各图书馆的分类标准仍是“糅杂参差,无一完善目录,可公应用”^⑤。图书馆分类标准的涣散,是中西知识无法融汇的缩影。洋务派、维新派或提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⑥,或追求“非中非西,即中即西”^⑦,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小说中以国别为标准对书籍进行分类,对于实际的图书馆建设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它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症候暴露出晚清的知识困局及造成这一困局的深层原因。

2.“国别”分类法的隔绝隐患

叙述者使用国别标准整理藏书,自认为迅速地实现了区分,达到了“一部一部的,分得极其明白,极其详细”^⑧的效果,然而这种区分却是以“中国书”与“世界各国的书”的隔绝为代价的。《电世界》的“春明塔藏书楼”将各国书籍放置在不同的楼层。《新石头记》的“礼让庄藏书楼”让中国书与外国书陈列在不同的房间。《乌托邦游记》则设了几万个书筒,将不同国别的书放置在不同的书筒。这三种方式虽有差异,效果却都是“中国书”与“世界各国的书”各拥天地,互不干扰。叙述者将“世界各国的书”带进了图书馆,却又将“中国书”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书”限定在一个个并不能交汇的独立空间中,使二者完全没有交叉的机会,这样的区分只是在表层和形式上区分出了“中国书”和“世界各国的书”,根本无法形成“中国中有世界,世界中有中国的”理想格局。图书馆里“中国书”与“世界各国的书”的隔绝,也是晚清中西知识无法会通的具体表现。

国别作为标准也无法实现涵盖的功能,并有可能将整体性的知识人为地变成局部的知识。虽然看起来小说中的图书馆里既有“中国书”,也有“世界各国的书”,但在叙述者的观念里,“中国书”大多只是儒家经典、道德文章,“世界各国的书”也只是些

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二者都只是片面的知识,而非知识整体。譬如《新石头记》的叙述者自认为“礼让庄藏书楼”里应有尽有,但从他所罗列的藏书情况来看,“中国书”只是《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春秋》这样关涉伦理道德的儒家经典;“世界各国的书”只有两部,“一部是《文明律例》,一部是《科学发明》”^②,只涉及制度、技术。对藏书的片面理解在《痴人说梦记》的“神宫藏书楼”里也同样出现。“神宫藏书楼”的藏书虽涵盖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其中既有培根的哲学著作,也有牛顿等人的科学著作,可是有机会入馆取书的贾希仙们却只选取“重学”“力学”“汽学”“医学”“电学”“矿学”“化学”“天文学”,丝毫没有使“世界各国的书”越出科学、技术的范畴。

3.“国别”分类法的保护动机

从本质而言,国别只能说明藏书出自何处,无法把握和显现藏书所属的知识类别及知识特征。叙述者之所以使用这一标准来对藏书进行分类,或受藏书之“全”空间维度的影响,或是叙述者对“中国书”,尤其是对“世界各国的书”的认知还有偏颇,但更隐秘的原因或在于叙述者对“中国书”的保护。

叙述者在小说里往往通过描述藏书陈列方式突出“中国书”的优越与神圣。《电世界》将“中国书”置于最顶层,以空间层级显示“中国书”优于欧美的书、非澳的书。叙述者还意犹未尽地提醒读者,藏有“中国书”的这一层“便算极点了”^③。“春明塔”本是电世界的地标建筑,塔尖上的灯又是电世界的图腾,“中国书”占据地标建筑的顶层,处于最接近图腾的位置,叙述者竭力帮助读者将“中国书”与神圣之物联系起来。《新石头记》将“中国书”居中摆放,“五洲万国”的书则环列其侧,“当中十间,是本国的古今书籍;两旁各五间,是五洲万国的书籍”^④。无论是“高”,还是“中”,叙述者摆放“中国书”的位置都是为了突出“中国书”在群书中的优势。

可是,图书馆里既然已经收藏了“中国书”与“世界各国的书”,“中国书”就必须与“世界各国的书”共存,也因此出现了被比较甚至是被取代的风险。叙述者之所以严格地区分“中国书”与“世界各国的书”,未尝不是为了以隔绝保障“中国书”的优越地位,防止“中国书”被比较、被取代。这一策略不仅仅存在于推崇“中国书”的小说里,《乌托邦游记》指责中国小说多是“种种没道理没见识的东

西”,读者都“受了它的迷,中了它的毒”^⑤,为表示对中国小说的轻贱,叙述者甚至将之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可是,如前所述,叙述者即便如此轻慢“中国书”,也还是微妙地保持了中国小说与世界各国小说的隔离,使它们归于各自的书笥,所有的中国小说还是以自身固有的形态存于图书馆之中。

《新石头记》或将“中国书”郑重地收于紫檀玻璃匣,摆在铺有五色锦毡的紫檀桌子上,或收于楠木玻璃匣,供于挂着黄幔幃的龛中。这些华美的装饰突出神圣的意味,也加固了“隔绝”,同时也形成了“保护”。这一保护虽然说明了“中国书”的珍贵,但也暗示了它的脆弱。《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虽确定京师图书馆的建设宗旨为“旁征博采”,但根本目的却是“以保国粹而惠士林”^⑥,其背后隐藏着有识之士对西学炽热、中学衰落的忧虑,“若不设法搜罗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驯至道丧文敝,患气潜滋”^⑦。此后各省奏请筹建图书馆的奏折大都沿用了“旁征博采”“以保国粹”的表述,根本原因在于“旁征博采”从情势上符合晚清知识者增益知识的实践行动,“以保国粹”则从文化、情感上维护了他们的文化尊严。小说叙述者对待藏书的“全”与“隔”,恰是对这一深层逻辑的集中体现。

三、知识使用者的主动性

晚清小说叙述者的精力多聚焦“藏书”,较少出现人物如何使用图书馆的情节。即便《新石头记》的“礼让庄藏书楼”里出现了宝玉的身影,但宝玉的功能也不是图书馆的读者,而只是一名走马观花的观光者,他对图书馆的要求也不是使用其中的“藏书”,“只是在这里看看各种东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就好了”^⑧。

1.没有读者的图书馆

与避而不谈人物如何使用图书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晚清小说不做解释就将读者并不完全了解的图书馆用作例证,来说明文明、维新、女权、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文明小史》以图书馆解说社会的“文明”,用“有人设立了一处藏书楼,几处阅报会。以为交换智识,输进文明起见”^⑨佐证省城风气开化。《负曝闲谈》用图书馆注解观念的“维新”,小说中的维新名人田雁门,其主要事迹就是“开了个阅报社,又造了座藏书楼,挂起维新的招牌”^⑩。

《女娲石》中图书馆与“女权”相映成趣,琼仙们生活的女权乐园里就有一座图书馆,方便她们“没事情到图书馆找书看”^{③⑥}。《飞访木星》中图书馆与科学如影随形,“我”推门就看见了博士那“合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一”^{③⑦}的房间。

叙述者将图书馆用作现代符号,源于晚清士人对图书馆功能的期待。在他们看来,图书馆可以通过培育人才,最终实现强国目标。郑观应曾为图书馆勾画美好前景,“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③⑧}。李端棻也希望图书馆最终达到“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③⑨}的功效。

2. 读者如何“发现”图书馆

事实上,图书馆是否可以发挥培养人才进而强国的功效,并不只取决于图书馆自身,更重要的还在于使用,尤其是读者的参与。晚清图书馆倡建者大多强调兴建图书馆的重要性,讨论如何兴建图书馆,还无暇关注图书馆的读者,对读者如何使用图书馆更是鲜有论述。《痴人说梦记》与《学究新谈》是难得一见的描述人与图书馆互动的小说,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超越了现实,补全了读者如何使物质的图书馆生产知识这一关键环节。

《痴人说梦记》讲述了贾希仙等人利用“神宫藏书楼”造福民众、实现强国的故事。贾希仙通过“仙人岛”上的“神宫藏书楼”,有机会学习“重学”“力学”“汽学”等科学知识,他运用所学与朋友们另辟疆域,创建了一座“镇仙城”。“镇仙城”现代化程度极高,目之所及,不是“弥望青葱,都是新麦。场上堆着这么多机器……一亩地能养十来口人”,就是“只见一车一车的煤铁,运出来的不少。就近就有什么生铁厂,熟铁厂,炼钢厂,机器厂等类”,或者是“只见那轧花的机轧花,纺纱的机纺纱,织布的机织布”^{④⑩}。

“神宫藏书楼”里的藏书对贾希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他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意识地对图书馆与知识进行了“发现”。“神宫藏书楼”实为“仙人岛”的原有建设,然而岛上的居民与它共处多年却没有从中受益,究其原因在于居民们普遍缺乏求知意图,将藏书楼闲置不用。贾希仙进入“神宫藏书楼”时“只见蛛网尘封,是个多年没人上来的光景”^{④⑪}。与岛上居民对藏书楼的冷落、漠视截然相

反,贾希仙听闻岛上有座藏书楼便心生向往,向岛主争取机会一览楼中所藏。丰富的藏书赋予“神宫藏书楼”承载知识的功能,可是直到贾希仙进入的那一刻,“神宫藏书楼”作为知识枢纽才真正启动。由此可见,“神宫藏书楼”成为个体成长催化剂的根源,并不只取决于图书馆本身,更取决于人的主动发现。“神宫藏书楼”是贾希仙命运的分水岭,贾希仙是“神宫藏书楼”神力的开发者。

3. 读者如何“兴建”图书馆

《学究新谈》讲述了白楚公等学生如何借图书馆实现自新的故事。白楚公等人原本荒唐度日,受到教师朱颂便以身殉教的感召,下决心洗心革面,其自新行为之一就是创建图书馆。较之“神宫藏书楼”的巍峨建筑、万卷藏书,这座图书馆十分简陋,场地只是借用了楚公花园里的藏修室,藏书也只是“眼前的都有了”^{④⑫},远未达到齐备的程度。然而这座简陋的图书馆却比“神宫藏书楼”更有现代气质。因为这座图书馆不是原有之物、被发现之物,而是创建之物。《学究新谈》没有采取《痴人说梦记》的奇遇故事模式,并没有设置一座原本具有魔力只待人发现的“藏书楼”,而是写了一座“图书馆”怎么从无到有被建设起来。“创建”较之“发现”,更能体现人在知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在这座自建的图书馆里,白楚公等人实现了自救,“潜心好学,不再去游荡了”^{④⑬},也因此初步具备了自省精神,“久而久之,自悔从前太觉荒唐,现今才知用功,已觉抛弃了光阴。……十分内愧”^{④⑭},进而影响他人,使这座简陋到无名的图书馆惠及众人,吸引得众人前来拜访。“神宫藏书楼”建在缥缈的海外仙乡,白楚公等人的无名图书馆偏于花园一隅,但从凸显人之于知识的主动性这一功能来看,后者并不逊色。

《痴人说梦记》《乌托邦游记》《新石头记》《电世界》《学究新谈》中的图书馆多是指向未来的想象。知识体系的不确定性与知识体系再建的急迫感督促叙述者多以写实的笔触展开尚未实现、实属理想的方案,由此生成的图书馆场景看似纤毫毕现,实为空中楼阁;虽属悬浮想象,又常常契合历史情境、情感结构。实景与幻象的交错、虚构与真实的参差,使本就矛盾重重的晚清小说图书馆书写愈发分歧丛生,也因此提供了一个观察晚清知识转型的文化层。

罗志田曾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征概括为“多歧互渗”^{④⑮},王汎森则用“复合性”进行归纳,指

出晚清思想文化常常“把显然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叠合、镶嵌、焊接,甚至是并置在一个结构中,但从思想家本人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逻辑一贯的有机体”^④。晚清小说的图书馆书写中的“全”“隔”“途”,是晚清知识体系“多歧互渗”与“复合性”的体现,印证了晚清外来知识正在逐渐生效,固有知识也仍在运行,不同知识系统是如何不断摩擦碰撞的,更体现了当“世界”成为“中国”之外的另一个知识来源时,晚清士人面对知识扩张、知识转型时的复杂心绪。矛盾与缠绕,是晚清小说图书馆书写的局限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晚清叙述者书写图书馆时的踌躇,也正是其现代性逐渐萌发的表现。

注释

①晚清对图书馆的命名不一,据统计共有“书院、书楼、书库、书阁、书藏、书籍馆、大书堂、义书堂、公书林、典籍院、藏书处、藏书楼、藏书院、图书馆、图书馆等十几个中文译名。”(程焕英:《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其中最常用的是“藏书楼”,晚清小说多以藏书楼或藏书处命名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②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月月小说》1906年第1卷第1期。③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趼人:《新石头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35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8、319、318、318页。④①②③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小说时报》1909年第1期。⑤刘响:《旧唐书·经籍志》,廉湘民等标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0页。⑥张廷玉:《明史·艺文志》,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⑦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第123页。⑧《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页。⑨《福

州藏书楼纪要》,《选报》1902年第25期。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月月小说》1906年第1卷第2期。⑮张德彝:《欧美环记》,林鍼、斌椿、志刚、张德彝:《西海纪游草 楼笔记·诗二种 初使泰西记·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53页。⑯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康有为、梁启超、钱单士厘:《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409页。⑰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页。⑱⑲沈绍期:《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187、197页。⑳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512页。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9年。㉒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页。㉓南亭亭长:《文明小史》,《绣像小说》1904年第40期。㉔蓬园:《负曝闲谈》,《绣像小说》1904年第20期。㉕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00页。㉖周桂笙:《飞访木星》,《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第5期。㉗郑观应:《藏书》,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87页。㉘李端棻:《论推广学校折》,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99页。㉙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旅生:《痴人说梦记》,《绣像小说》1904年第52期。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蒙:《学究新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3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3、282、284页。⑮罗志田:《自序》,《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⑯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566页。

责任编辑:采薇

Library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Novels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Zhang Yi

Abstract: The change of modern book collection mod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ppearance of public library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of seeking knowledge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affected their literary expr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library began to become the object of the novel. Focusing on the items of collection, catalogue and readers of the library, the late Qing novels discussed the source, order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by way of either true or imaginary manner, which retained many aspects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 contradictory and conflicting way. This kind of writing contained the complex knowledge experience, knowledge system and knowledge concept of scholar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nriched the modernity of the late Qing novels from the aspects of object, experience and concept.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novels; library writing;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